

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丛书副主编

张增田
刘丽群

简明

中国教科书史

◎石鸥 吴小鸥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ZHI SHI CHUAN QUAN CHU BAN SHE

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丛书副主编

张增田
刘丽群

简明

中国教科书史

◎ 石鸥 吴小鸥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ZHUANLI QUAN
Copyright ©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国教科书史/石鸥, 吴小鸥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1
(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

ISBN 978 - 7 - 5130 - 3100 - 4

I. ①简… II. ①石…②吴… III. ①教材—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G423.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153 号

责任编辑: 汤腊冬 刘丽丽

责任校对: 谷 洋

封面设计: 陶建胜

责任出版: 刘译文

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

简明中国教科书史

石鸥 吴小鸥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8 责编邮箱: tangladong@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3100 - 4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我们是由教科书决定的”

人们习惯于指责权力的介入，没错，权力是极端重要的，但权力的介入有时候却是次要的，因为它往往被有些人警觉地关注着，有人要把权力“锁进笼子”里。民间的认识习惯才是主要的，甚至关键的。有时候，真相无法起到真相的作用，长久以来形成的符合人们认识的一些非真相及其演绎出来的故事更重要。比如教科书中的岳飞、三皇五帝，比如学界对蔡锷与小凤仙的定论，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现在的问题或困惑是，不管有没有找到真相，人们似乎已经不需要真相了，社会似乎也已经不需要真相了。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熟识的那套即便是非真相的东西。“符合需要”比“符合真相”更重要。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堂吉诃德式地去努力挖掘真相。真相帮我们回忆和反思，帮我们认识我们的先辈，其实这也是帮我们认识自己，更是帮我们认识未来；真相能够让我们更聪慧，避免或少犯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这套“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揭示与展示教科书发展历史中的真相或事实。老课本虽不足以涵盖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但老课本是我国近现代文化中最细小、最有魅力的碎片，有了它们，才能勾勒出魅力文化或真实文化的全貌。

我们这套书的选题有着多方面考虑。

我们认为，关于我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一个研究基础薄弱、学术开拓空间相当广阔的领域。说研究基础薄弱，主要是史料建设工作严重滞后，关于教科书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开发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量相关文献史料尚尘封在历史角落里，没有进入研究和阅读的视野，文献资源的封闭、散佚和流失现象严重，学界对此重视不

够，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长时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说学术开拓的空间广阔，主要是因为教科书涉及各学科领域，早期教科书中蕴含着学术转型、整合、成型的要素，体现了我国西式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尤为重要的是，早期教科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有多方位的、特定形式的反映和描述，它们是研究该时期社会思潮、认识与行为、语言形态、乡风民俗、价值观、人生观等领域的鲜活而宝贵的历史材料。教科书是一支最朴素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变革。一本本教科书反映出一段段近代中国教育、甚至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历史，透过清末民初教科书，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近代教育开启、演绎、转轨的足迹，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变革的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正因为这些因素，对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历程的进一步梳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格外艰难。《简明中国教科书史》就是力求借助我们团队以及日益增多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教科书发展历程作更清晰的脉络化工作。尽管仍然远远不够清晰。

张爱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仔细想来，他们之所以如此幸运，竟然是他们幸运地诵读过那时的教科书。我们很看重教科书的价值。派纳说，“我们是由课程决定的”。而课程最重要的载体是课本，即教科书。所以可以把他的话改一下：“我们是由教科书决定的。”教科书的作用具有隐蔽性、柔性的特点，很难让一个人说出自己在哪些方面确实受到了教科书影响。教科书的影响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主体的内心，成为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智世界之一部分。

教科书在哪里读响，启蒙就跟进到哪里。在有教科书读响的地方，文明出现了，生长了，新社会也形成了。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教科书。我们看重这样的教科书，我们怀想它们，思忆它们，要还它们本来面貌。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因其在开启民智民德中的作用，为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利用。所以，百年来既有显赫如张之洞、严复、张百熙等人编创的课本，又有一些地位普通的知识人编纂的课本，他们找到了一种自己的发声系统——编写课本，这是边缘者的武器。边缘者不像革命者，不总是用不合作、起义、暗杀等方式，他们借助课本催生新生活、新社会。《百年中国教科书忆》就是对这些有代表性的课本进行追忆式的挖掘。当传统经典从高高的殿堂步向现实的课堂，当救亡图存与重塑国民

精神的时代呼声转化为孩童们诵读的浅白课文，当新思想、新知识经过小课本的反复传播被国人认同为公理和常识，小小的课本就为中国大大的启蒙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一个世纪后，当我们诵读这些略显粗糙的课文，体会着我们的先辈那忧国忧民也不无偏狭的爱国情怀，内心依然充满感动。

我们觉得，任何教科书都有其特定的意义与价值，即便是遭到世人唾弃的教科书。比如文革时期的教科书。尽管社会彻底否定了“文革”，历史似乎已把“文革”遗忘，但“文革”还是犹如现实的影子，伴随现实而行。确实，“文革”时期的教材浅显、充满说教，但有一条大体上可以认同，在“文革”的教材和教学下，孩子们既有童年，也有学习。孩子们在“文革”的课本中，心比天高又嘻嘻哈哈地一路学来，没有压力，没有痛苦，只有不自量力的崇高与责任。这一点恐怕是今日学生所永远难以企及的。“文革”课本不论多么肤浅，我们总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不存在。它存在了十年，实实在在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实实在在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完整接受十年“文革”教育的）。《新中国“红色”课本研究》就是要唤醒它们，由唤醒“文革”课本到唤醒今天的人们去关注“文革”、警觉“文革”的阴影。

如果说十年“文革”是短暂的，那么百年的乡土教材发展历程够长了吧。乡土教材几乎与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同步产生和发展。是的，乡土教材历经百年，它们从激发爱乡之情到晕染出爱国之情，它们在保护乡土文化，构建和谐乡村；它们在唤醒学子知乡、爱乡、建设乡村；它们在培育乡里乡亲和谐的邻里关系上起了不可替代又亟待研究发掘的作用。今天的人们，为乡村的失落而忧虑，为乡里乡亲的完全陌生化而伤感，为乡村文化的碎裂毁灭而奔走呼号。可他们是否想过，这一切难道与乡土教材的失落没有关系吗？这种失落既表现在对乡土教材的不重视上（乡土教材离消失已经不远了），也表现在乡土教材本身的“弱智”上，看一下百年前的乡土教材，比较一下今天的乡土教材，便能够引起我们的许多思索。希望《百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成为一次振兴乡土教材的呼号与呐喊。

清末民初，在南方一所西式女学堂，一群女孩在教室读书。她们中有陈衡哲，有秋瑾，有冰心，有丁玲，有萧红……“只须案摊书本，手

捏柔毫，坐于绿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画图。”她们是当时真正独特的风景，她们是社会的异数，她们更是未来。构建未来的不是刺刀，不是监狱，而是学堂中的女孩子们，她们青春焕发。也许还饥肠辘辘地在与家庭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但她们充满希望，正从课本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女子教科书与女子学堂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女子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如何？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明的引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在女性成长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性》一书，力求给我们某种答案，某种启迪。

在经历长征等重大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迅速扩大其实力，并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抗战？的确，日本侵略中国为党的战略策略调整和党在新的斗争环境下的生存、发展、壮大带来了一定的契机，但若无潜在的力量和正确的举措，契机也会失去。众所周知，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约两万五千人。以如此微弱的力量，如何能在短期内成功地动员千百万农民投身共产党，投身抗战？共产党在乡村地区组织和动员的工具是什么？谁架起了共产党革命理想与农民现实主义之间的桥梁？共产党通过什么将散漫的小农组织改造成为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何以在革命根据地被广大穷人内化为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信念？弱小的共产党何以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变化及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获得广大民众持续的认可和拥护？……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我们注意到，以往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意识形态、政治冲突、权力斗争、阶级对立、军事行动等。这种研究受历史研究中专注于宏大叙事的影响，倾向重大事件和上层精英，极少注意到西北农村学校及其教科书在其中的意义与价值。即便某些研究注意到了学校与革命的关系，也只是聚焦于学生运动或少数革命精英学生，忽视了教科书在其中的作用。而一旦翻阅根据地的《共产儿童读本》《初级新课本》《战时新课本》《国语课本》，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拥有最多读者的根据地宣传载体，教科书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共产党领导合法化过程中的作用远未被挖掘出来。教科书把共产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它们传播现代基础文明，灌输无产阶级的话语系统，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指导民众；它们既充满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亲农倾向，是沟通知识精英和农民大众的天然桥梁。根据地小课本所起

到的大宣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正是《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想要梳理与表达的。

.....

当下，教室正在失去学堂的味道，教科书越来越令学生产生将之从窗口扔出去甚至撕毁的冲动。此刻，面对百年前，或半个世纪前的泛黄的老课本，突然，一种感觉袭来，我们都将逝去，我们正在逝去，而它们还存在着。它们让人反省，让人产生敬畏。

本套书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社科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研究”（BAA120011）的部分研究成果，是我们“教科书团队”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团队，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团队。这个研究团队由我本人领衔，以首都师范大学为基地，辐射全国，主要研究力量有赵长林、吴小鸥、张增田、王昌善、方成智、李祖祥、刘丽群等教授，有段发明、李水平、刘学利、廖巍、刘斌、吴驰、石玉、赵志明、李新、刘景超、崔柯琰等博士，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教科书研究进行拓展研究，为团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本套书的完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我的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所有研究生，他们前赴后继，从教科书的整理、归类，资料的查询、书稿的校对等多方面为我们的教科书研究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他们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大量美好的身影与姿态，但我可爱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我心中，烙下深深印记的，你们最优美的身影与姿态，是你们读书的情影，是你们整理书的情影！教科书是你们的T型台。

总体上说，这套书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面世，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感谢孟繁华教授，感谢蔡春、张增田等教授。我们还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汤腊冬女士。感谢我的研究团队，感谢我的学生，我的研究同伴。如果没有他们，很难想象这套书会顺利完成。这都不是客套话。

由于本套书的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思路与表达风格，我只对形式方面作了一些统一规整，对一些大的结构调整提出了建议，同时提供了所有的教科书照片，没有对其他作者的书稿内容进行全面考校，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首都师范大学 石 鸥

2014年教师节改定于学堂书斋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演变的若干特征

(代序)

石 鸥

我们不把传统的教材称之为教科书。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它们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是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学科而分级、分册、分科编写，应该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① 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百千千”，还是“四书五经”，因为它们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在教和学上是完全由教师随意决定的，在内容上是综合笼统而不分科的。所以，我们说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负责编辑教科书，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使用。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出现，学界推论“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教科书”一词逐渐流传开来。^② 但是，从实物看，真正使用“教科书”一词的文本在我国产生，极有可能出现在1897~1900这四年间，^③ 1897年前几乎没有

① 石鸥：最不应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5）：5-9。

②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教科书之发刊概况[M]//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附录）。上海：开明书店，1934：115。

③ 我们认为，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当时的中文名翻译称为“益智书会”而不是“教科书委员会”就是明证，说明还没有使用“教科书”一词。事实上，19世纪70~90年代中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以“教科书”命名的实物，当时一般称之为“课本”“读本”“启蒙”“须知”，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教科书”的书。

出现过使用“教科书”一词的课本。

基于这一认识,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肇始时间应该在19~20世纪之交。一百多年来我国教科书的发展,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的教科书发展,又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基本阶段与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对于中国命运的再思考使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西学大量引进,新式教育破冰而行,新式教科书显露头角,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如开闸之水,迅速涌入古老的中国,掀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启蒙的帷幕。

1. 西学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这基本上是西学教科书的翻译引进阶段,大体可以定位为“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大量引入科技知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开始了学术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的西学书籍几乎都为科学技术类,且从零星到系统,门类逐渐完善;第二,西学书籍的编译与出版机构集中在教会主持的机构,如墨海书局、美华书局等,以及洋务运动的教育与出版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第三,西学书籍流传于社会及学堂,与教科书没有明显界限,二者几乎同一;第四,西学教科书的编译者主要是欧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

这一时期西学教科书基本适应了当时的教会学堂、洋务学堂及其他少量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然而这些西学教科书的基本要素不全,没有分级,不注重教,也不注重学,没有教授法等,所以还只能被看作现代教科书的雏形,是现代意义教科书的萌芽,属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教科书,我们一般称之为“西学教科书”。

2. 中国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这是教科书的引进与自编自创结合、引进逐渐被自编取代的阶段,

是教科书涉及学科基本齐全、教科书要素日益完善的阶段。可以定位为从近代迈入现代的教科书阶段,起于南洋公学自编的教科书(1897),止于清朝终结。

戊戌维新、新学制和废科举后,新式学堂迅猛发展,对教科书的需求也就急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以翻译材料为主的教学用书就显然不合适了。结果,先是一批新式学堂因不满足于从西方引进的教科书,自己开始编写适合本学校需要的教科书,代表者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等;与此同时一批民间书坊进入教科书开发领域,各色各样的教科书出现了,代表者有文明书局及其“蒙学科学全书”、商务印书馆及其“最新教科书”、清政府的“学部第一次编纂教科书”,它们满足了社会大规模的新学堂发展需求。这一时期教科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学堂自编教科书产生并扩大了影响和使用范围;第二,伴随着1902~1904年新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03)出版发行,紧接着由学部编撰的第一套国定本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教科书要素基本齐全,分册、分级、分学科编写,有教授书配套,所以已经属于现代教科书;第三,大量零散的、单科的教科书产生;第四,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作者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主,许多教科书原型也是日本教科书;第五,民间教科书和官方国定教科书同时使用,相互激励和竞争。

在社会和教育大背景下,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闪亮登场,迅速成型,并很快取代了西学教科书,基本满足了大规模新式学堂的需要。这些教科书适应了当时社会动荡、发展参差、需求不一的教育格局,既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良好动机,也体现了改革的知识精英们力求用新思想、新科学启蒙民众的强烈愿望,它们在科学、伦理与政治民主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时期(20世纪初至1926年)

民国成立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几年(依据学制的教科书全面推出)是教科书兴盛、定型与规范化的阶段。民国新政体要求下的新教科书雨后春笋般涌现,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中华教科书”的出现开启了新政治、新教育体制下的教科书变革大幕,“共和国教科书”更是

上演了一出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最壮观的大戏。紧接其后的还有“新制中华教科书”“新式教科书”，以及“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等，为共和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规模大、种类全，教授法配套，逐渐占有并控制了绝大多数学校市场。相应的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小规模、零散品种的、影响小的书坊教科书和学堂教科书纷纷被挤出市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民国新教育要求下的新教科书迅速涌现，满足了新课程的需要；第二，零散的、单本单科的、小型出版机构的教科书逐渐被挤出学校、挤出市场，被大型出版机构的成套而完整的教科书取而代之；第三，壬戌学制颁布，适应新学制需要的大量教科书产生，一批崭露头角的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加入到教科书编撰的行列，取代了这以前的留日学生主体，闪跃出胡适、冯友兰、陈哲衡、竺可桢、马君武、丁文江、何炳松等一大批让人景仰的名字；第四，教科书质量总体上明显提升，教科书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第五，以白话编写的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横排教科书逐渐取代竖排教科书，教科书形式基本定型。

4. 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27年至1949年）

这是教科书稳定、制度化并略显沉闷的时期，也是教科书全面服务抗战、服务尖锐的阶级对抗的时期，是一个统整和分化并行的时期。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二元对峙，逐渐分割成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足鼎立”的不同政治气候。这三个政治时空分划形成了不同政治语境下的教科书的新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教科书话语特点。这期间的基本特点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强化、抗战期间的“三地”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教科书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摒弃了多样化探索，消溶了各种分散的教科书市场，取缔了以前教科书发展的自由、包容的局面，教科书逐渐统一，也逐渐走向僵化。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导致教科书分化发展，分化后的教科书特色鲜明，其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与意义

我们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属于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看成是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1. 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的广狭义之分

所谓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宽泛和精确之分。宽泛而言,伴随着新式学堂教科书的出现和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出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约1897~1926年期间,可称之为黄金三十年。^①精确一点说,这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903~1923年期间,从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产生,到奠定了现代学制基础的新学制教科书(1922)的出现,约二十年时间。

即便宽泛,但我们还是很看重在1903年现代教科书出现之前几年的学堂自编教科书(以1897年南洋公学课本为标志),这可视为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启动时间,也看重1922年新学制后多种相应教科书的全面完成时间(1926年前),所以粗略地认为是三十年,提出“黄金三十年”的概念。

2. 教科书黄金时期的成就、影响与表现

在教科书的黄金岁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尤显辉煌。

成就一,传统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教科书对传统经典教材取得全面胜利,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新式教科书体现出了它对旧教材的极大优势。在漫长的传统教育里,“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但是当1902~1904年新学制颁布、新学堂普及、新课程实施以后,这种不分科、不分年级,不顾教与学、只重灌输的旧教材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旧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难“传之于人”的文本,旧学堂教、学这种文本,结局只能是“人人能读经而能经学者无几,人人能识字而能小学者无几,人人皆作文而能词章学者无几”。^②所以,在西学

① 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②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2003:142.

知识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理论上它们就已经失去了作为新学堂教材继续存在的基础。尽管有人尽力挽救这些教材，大声疾呼要学习这类经典教材，^①甚至安排了读经等课程，但这些抵抗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一味灌输的传统旧教材敌不过按照西方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教、也关注学的新教科书。^②甚至旧学人也不得不承认，教科书注重方法，“使人一见而能”，此为过去所无，所以即便传统经典需要学习，也应该按教科书编之。张之洞更是明确表示，中学之“存”不能不靠西学之“讲”。旧教材被取代已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教材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广义的教材不得不退出。在文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以“教科书”全面命名的狭义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读本向教学结合教科书文本的转型，这以后学校用书几乎都清一色改用“教科书”之名，很少再以课本、教本、读本的名义出现。

成就二，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现代教科书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以普及。没有海量教科书，任胡适等知识分子如何呼号呐喊，白话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同理，没有白话文，现代教科书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并迅速大规模普及，也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推进新教育，快速取代科举。尽管今天普遍认为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用简单的文言文和粗浅的白话文编撰教科书的尝试，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书室。这家书室规模并不大，但它却编印了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从1903年开始，彪蒙书室着手编写出版白话读本蒙学丛书，包括《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等，据统计，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以白话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不

① 比如，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幕僚戴姜福宣统二年就曾经建议，让所有学生都读《论语》，小学生能够背记《论语》的才能上中学，中学生能够解读《论语》的才能上高等学堂。但赵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赵尔巽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468）。

② 当时的士人已经意识到旧教材与新教科书之间的差距。许之衡1905年就指出：经学乃孔子之教科书，今人能够完全理解者极少，这因为旧教材与今天的新教科书不同，“若易以今日教科书之体例，则六经可读，而国学永不废”（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一年第六期，1905）。这已经承认新教科书的体例要优于旧教材。

少于75种。^①关于做白话教科书,编者在1903年就表示:“做这种书的人,因为我中国识字的人很少,便想一个容易识字的方法,要使我中国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人不识字,无一个人不知道字的用处,这是做书人的主义。”^②明确说明了白话之于教育的意义。与此同时,广东的陈子褒也编纂了大量通俗或白话课本,在广东地区几乎取代了传统经学蒙学读本。^③事实上,随着西学中的科学教科书的传入,一些学科门类、一些科学公式、一些科学名词、一些科学符号很难在中国传统教材文本中呈现(试想一下,英文教科书或化学分子式要通过中国传统文本的竖排方式理想地呈现出来有多么艰难),所以,白话文及其排版很早就部分教科书中出现了。到1922年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使用白话文。反过来,白话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书的流传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就三,建立了教科书最重要的制度——教科书审定制,理性地对待国定教科书,从而使之成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为后来的教科书使用创设了榜样。当教科书大量涌现之时,完全放任自流并不是理想状况,清学部首开教科书审定之风,民初教育部并没有让这一教科书事业中最重要的制度断裂,而是不断完善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审定蔚然成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尽管晚清学部自己编撰了教科书,但在听取多方意见后,并没有一意孤行地借助政治与权势强行让自己的课本进入课堂,更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间教科书的存在空间。学部没有赋予自己费尽苦心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以使用的特权,而是依市场法则,高度赋权给地方、学校、校长和老师,把教科书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质量优先——这一做法开了限定国定本教科书的权力空间的先河,明确了国定本不是垄断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优良传统对后来民国教科书制度都有重大影响与约束。

除了三大直接成就,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

① 彪蒙编译所编辑.绘图蒙学论说实在易[M].5版.上海:彪蒙书室,1909:广告页.

② 施崇恩编.绘图识字实在易[M].上海:彪蒙书室,1903:凡例.

③ 石鸥,廖巍.通俗是贵——陈子褒课本之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5):5-11.

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19~20 世纪之交,本土与外域的持续碰撞,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时代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政治变革出现了,科技求强出现了,现代教育出现了,一批最不能被世人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一个特定的地域,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一本本教科书促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传播了各种新思想、新学术,论证并推进了思想开放;一本本教科书自由讨论思想文化政治,启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构建文明社会的话语系统和基础力量,为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教育寻求新的参照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孩儿。

我们有理由认为,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之所以是中国各领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思想活跃、流派纷呈的时期,之所以是社会变革大起大落的时期,这与 19~20 世纪之交的教科书千姿百态,共演思想解放舆论准备大戏这一格局密切关联。仅以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为例就可窥见一斑。

章开沅先生曾经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找原因,提出:“百日维新是幸逢其时而不得其人”。^①其实,更准确的是“幸逢其人而不得其时”。有皇帝、有康梁,难道还不能说“幸逢其人”?而失败是因为新教育未开,新教科书未出,人们没有被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所触动,没有对比,没有追求,没有想到还有另外的制度、政治与社会。甚至在士大夫精英中,有新思想、新知识者也寥寥无几。这个时候,任变法者颁布的维新诏令雪花般飞舞,也只能看作主观愿望,一厢情愿。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民众还没有准备好,心态、文化、思想、观念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变法。所以,不管是谁,都无法完成这场不能完成的变法,它失败得如此迅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谭嗣同曾经自责性急而导致事情不成。其实,性急也就意味着时候还不到,之所以时候不到,是因为新思想未传播开来。

几年后情况就变了,1898~1911 年,几乎是新思想、新观念如火

① 章开沅. 改革也需要策略 [J]. 开放时代, 1998 (3): 12.

如荼的涌现时期,教科书则把它们传播到千家万户,由此推动了近代中国群众性的启蒙高潮的形成。严格说,辛亥革命也并没有“幸逢其人”的运气(武昌枪响时,孙中山还在大洋彼岸,黄兴也是半个多月后赶去武昌的),但它有幸“得其时”——民主、自由的思想,宪政、共和的观念随着海量的新式教科书铺天盖地而来,^①民智为之而开,民心为之而新,武昌的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各地已经插满了革命的旗帜,读书声成就了枪炮声,革命的成功乃为必然。

五四运动之所以一呼百应,也有这一道理蕴藏其中。^②在1912年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中,仅“共和国教科书”10年间就销售7000万~8000万册之多,^③还不包括大量形形色色的手抄本、翻刻本、盗版书。较之于教科书,《新青年》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作品的发行量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据统计,《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到1917年时,其发行量从创刊时的1000册增加到了1.5万册左右。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的许多被认为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就发表在该刊物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等。从发行量上看,至少当时这些作品的影响面还是有限的。

没有教科书的普及,就不会有大量学子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也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广大人民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的,正是浅显易懂、深入千家万户、绝大

① 比如,1904年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一经出版便势不可当,发行后几日内便被抢购一空,“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1996年,第111页),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最新教科书。1907年就有传教士惊叹:到目前为止,商务印书馆“所编印的优良教科书,散布全国”(Rev. H. S. Redfem, *The Educational Review*, 1907, No. 6. P3),而对比维新运动时康有为那慷慨激昂的“公车上书”,也只能影响极为有限的部分学子。

② 据统计,1912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后迅速受到欢迎,一印再印,我们在版权页上看到的不完整信息非常惊人,如《新国文》第1册于1912年6月初版,1922年2月则高达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

③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184/node63892/userobject1ai14500.html>.